

第二次布伦纳论争

鲁保林 陈鸿池*

【摘要】布伦纳认为,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盈利能力下降,根源在于制造业部门国际竞争加剧所引发的产能过剩和生产过剩。过度竞争导致的利润率下降之所以迟迟无法改善,主要是因为供给过剩的领域退出迟缓,且新的厂商进入过多。布伦纳指责供给侧解释片面强调资本与劳动的“纵向”关系,低估了资本之间的“横向”关系及其引起的经济矛盾。批评者则认为,将利润率下降归咎于国际竞争的线性解释存在严重的问题,并且不能先验地把劳资关系置于资本主义历史叙事的中心。本文系统地梳理了围绕布伦纳“国际竞争过度论”展开的这场论争,并将其概括为“第二次布伦纳论争”。

【关键词】利润挤压;过度竞争;制造业产能过剩;竞争关系;劳资关系

一、引言

利润率与资本积累的宏观动态是政治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主题之一。1998年,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长文《全球动荡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后经部分修订,于2006年以专著的形式出版。该文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竞争为分析的起点,以利润率下降论为分析的基础,以美国、德国和日本三个国家的互动为主轴,描绘了一幅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从长期繁荣向长期停滞转变(1950—1998年)的宏大画卷。在布伦纳看来,长期繁荣源于高

* 鲁保林,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鸿池(通信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chc0716@ruc.edu.cn。

引文格式:鲁保林,陈鸿池. 2025. 第二次布伦纳论争[J]. 政治经济学季刊,4(4):108-133.

Cite this article: LU B L, CHEN H C. 2025. The second Brenner debate[J].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4(4): 108-133. (in Chinese)

利润率的实现和持续,长期停滞则是盈利能力下降且未能恢复的结果。具体而言,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末期间实现并维持了近20年的高利润率,使得美国、欧洲和日本开启了战后的长期繁荣。而1965—1973年间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无论从单个国家抑或整体层面来看)出现了利润率的急剧下降:这一下降首先发生在制造业,然后波及整个私人经济,首先从美国开始,然后席卷了西欧和日本,最终导致战后繁荣的终结(布伦纳,[2006]2016,序言,p.2)。

布伦纳的文章一经发表,就立刻轰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学界再次把目光聚焦到积累的宏观动态和经济危机理论上。包括约翰·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詹姆斯·克罗蒂(James Crotty)、本·法因(Ben Fine)、热拉尔·杜梅尼尔(Gérard Duménil)等在内的数十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参与了这场论战,掀起了一波又一波争论的热潮。笔者将这场争论称为“第二次布伦纳论争”,以区别于始自1976年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的“布伦纳辩论”(The Brenner Debate)^①。该文之所以能够引起如此广泛和长时间的争议,与布伦纳关于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利润率轨迹的独特解释有关。在他看来,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盈利能力下降,根源在于制造业部门国际竞争加剧导致的制造业产能过剩和生产过剩。过度竞争导致的利润率下降之所以长期恶化,且迟迟得不到改善,主要是因为供给过剩的生产领域退出不足和进入过多。第一,后来者将更廉价的劳动力与更高水平的技术结合起来,使得生产同一产品的成本更低(布伦纳,[2006]2016,p.37)。第二,面对低成本新进入者的挑战,高成本的老牌制造商仍然选择留在而不是退出所在行业。这是因为:一方面,多年经营所积累的专有无形固定资本,诸如独到的市场信息、与供应商和客户的良好关系以及技术诀窍等,只有继续留在原有行业中才能实现其价值。另一方面,厂房、设备、机器等有形固定资本是一种“沉没”资本,只要在新的、更低的价格水平下,老牌制造商至少可以获得基于流动资本(对劳动力、原材料和半成品的追加投资)的平均回报率,那么继续留在原来的行业就是一种理智的选择(布伦纳,[2006]2016,p.30,36)。于是,在制造业的国际市场上就出现了“后来者吃先来者,而先来者则赖着不走”的局面。第三,信贷增长导致产能过剩和生产过剩持续难解。大量的借款虽然有利于让低利润公司继续存活下去,但是也使产能过剩和生产过剩更加严重,不仅延缓了盈利能力的恢复,而且使得经济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上升(布伦纳,[2006]2016,p.37)。第四,各国竞相采用汇率贬值的方法来提升本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试图将利润率下降的不利影

^① 1976年,罗伯特·布伦纳在《过去与现在》杂志发表长文《前工业化时期欧洲农业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提出阶级斗争及其形塑的社会财产关系才是影响长期性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由此开启了近20年的“布伦纳辩论”(关锋,2022)。

响转嫁给其他国家。汇率的变动已然成为各国资本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

显然,布伦纳的“国际竞争过度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马克思认为,一般利润率下降的主要驱动力是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节约型的资本积累与扩大再生产过程必然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而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必然会驱使一般利润率下降。

二、布伦纳对供给侧解释的批判

布伦纳关于战后资本主义利润率趋势的历史和理论分析,建立在对利润挤压论的批判之上。他甚至还给后者贴上了一个“供给侧解释(Supply-Side Explanations)”的标签。利润挤压论认为,国民收入中的利润份额降低是利润率下降的直接因素,其深层原因是收入分配发生了有利于劳方的变化(鲁保林, 2013)。通常情形下,利润率可以分解为利润份额和产出资本比的乘积,即 $r = \frac{\pi}{K} = \frac{\pi}{Y} \cdot \frac{Y}{K}$ 。其中, r 表示利润率, $\frac{\pi}{Y}$ 表示利润份额, $\frac{Y}{K}$ 表示产出资本比。如果利润率的下降主要是由利润份额 $\frac{\pi}{Y}$ 下降所致,那么就可以称利润受到了侵蚀或者说“挤压”。令产出 $Y = W + \Pi$, 利润份额 σ_π 与工资份额 σ_w 可以相互转化: $\sigma_\pi = \frac{\Pi}{Y} = \frac{Y - W}{Y} = 1 - \sigma_w$ 。工资份额可以表示为: $\sigma_w = \frac{W/L}{Y/L} = \frac{w}{y}$ 。 L 表示劳动小时, w 表示平均小时工资, y 表示平均小时劳动生产率。根据利润受挤来源的不同,利润挤压大致分为劳工实力增强和生产率拉低两种类型,前者表现为工资升高,后者表现为生产率下降。

劳工实力增强论认为, w 的上涨推高了工资份额,对利润和利润率形成挤压。至于劳工实力上升的原因,有“劳动后备军耗尽说”和“工会力量增强说”两个版本。博迪和克罗蒂发现,在典型的经济扩张中,利润—工资比出现了显著下降。在扩张初期,单位劳动成本相对于产出价格下降,但通常过了扩张中期就会超过价格。对此,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在经济扩张的后半段,劳动力越来越稀缺甚至出现劳动后备军耗尽,这一变化增强了劳动力市场上工人阶级与资本家对抗的谈判筹码,使得前者成功地争取到更高的实际工资(Boddy and Crotty, 1975)。与博迪和克罗蒂不同,格林与萨特克利夫侧重于讨论工会实力的增长以及工人阶级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他们发现,战后英国利润率的急剧下降是由劳动份额上升引发的。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劳工的工资需求上升。二是国际竞争加剧,企业无法像以前那样通过提高价格来转嫁工资成本(Glyn and Sutcliffe, 1971)。

博迪和克罗蒂在研究经济周期运动时发现,生产率降低会对利润造成挤压。在扩张初期,生产率有巨大提升,一部分归因于最优要素比例。到了后期,生产率出现下降,一部分归因于持续面临的技术瓶颈。另外,充分就业不仅会影响工资率,还会影响辞职率和罢工率。有利的劳动条件意味着,车间里劳工付出的努力可能会减少。因此,在经济扩张期,不易控制的劳工也对生产率下降造成了影响(Boddy and Crotty, 1975)。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利皮茨通过比较 1950—1974 年英、美、德、法、日等国的实际工资和生产率增长趋势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利润挤压的来源不是实际工资增长,而是生产率放缓(Lipietz, 1986)。这是因为福特主义劳动过程组织方式已经式微,阻碍了生产率的增长(Lipietz, 1988)。因此,把危机归因于“阶级斗争”是正确的,但是,这是发生在劳动过程而不是分配过程中的阶级斗争(Lipietz, 1986)。

从产出 $Y=W+\Pi$ 公式来看,当产出 Y 不变,工资 W 和利润 Π 确实可以看作两个互为消长的对立因素,因此利润挤压论有其合理性。但是,自该论说提出以来,也出现了许多质疑乃至批评之声。布伦纳就是其中之一。布伦纳反对利润挤压论的理由包括:一是就业增加虽然会诱发工资上涨,但同时也会透过需求侧促进销售增加,提高产能利用率,进而对利润率产生积极影响(布伦纳, [2006]2016, p. 18)。二是工资增长会诱发劳动节约型技术创新,提高总生产率(布伦纳, [2006]2016, p. 18)。三是工资增长会通过劳动力和资本市场自身的运行机制使劳动力供给增加,比如廉价劳动力的输入或者资本向外输出(布伦纳, [2006]2016, p. 19)。不过,这一看法与其核心观点是相冲突的,即由于“沉没成本”的存在,高成本的老牌制造商选择继续留在而不是退出原来的行业。四是利润挤压论难以解释全球衰退的同步性。1965—1973 年,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同时经历了衰退。而且,这些经济体又步调一致地在 1970—1971 年, 1974—1975 年, 1979—1982 年, 1990—1991 年经历了衰退。但是,各国劳动者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受本国制度或政策的限制,而且也很难说任何国家的工人都具备足够的实力来挤压利润(布伦纳, [2006]2016, p. 22)。质言之,资本积累导致的劳动力供不应求,只可能在短期内造成利润挤压,通常不可能引起普遍的、长时期的利润率下降,因而也不会引发长期的、系统性的经济衰退(布伦纳, [2006]2016, p. 21)。

实际上,工资提高同利润率降低的一般规律无关。马克思指出,“如果工人阶级提供的并由资本家阶级所积累的无酬劳动量增长得十分迅速,以致只有大大追加有酬劳动才能转化为资本,那么,工资就会提高,而在其他一切情况不变时,无酬劳动就会相应地减少。”(马克思和恩格斯, 2009c, p. 716)但是,“一旦这种减少达到这样一点,即滋养资本的剩余劳动不再有正常数量的供应时,反作用就会发生:收入中资本化的部分减少,积累削弱,工资的上升运动受到反击。

可见,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决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c,p. 716)在马克思看来,工资上升造成的利润挤压在短期内可能存在,但是从长期来看,它会因为积累的放缓而难以持续。所以,这种情形作为特例被排除在了利润率下降的一般规律之外。马克思甚至将其类比为市场价格与价值规定的关系,即“利润率的提高和降低,就它是由工资的提高或降低造成的这一点来说,……同利润率提高或降低的一般规律没有任何关系,正像商品市场价格的提高或降低同商品价值的规定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2013,p. 296)

用工资率提高来说明利润率的降低,“在例外的场合也是存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d,p. 267)。对此,威克斯(Weeks,1979)评论道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意味着,任何关于积累过程中产业后备军的严肃讨论,都必须考虑技术变革及其与积累的关系。根据这一标准,所有的利润挤压理论都是失败的。简言之,利润挤压论者论证的核心是产业后备军与积累的关系,但却停留在最表层。特别是他们必须证明生产率变革存在一种系统性趋势——生产率的变革速度不足以补充产业后备军。如果不能证明这一点,那么产业后备军下降造成的工资上升和利润率的下降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例外”。当积累过程产生的生产率增速不足以补充后备军时,会导致实际工资上升,而此上升若不能被商品价格下降完全抵消,剩余价值就会减少。在这种情况下,积累步伐就会放慢。一旦劳动后备军得到充分补充,则积累会再次加速(Weeks,1979)。

一般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和阶级关系的制约下,劳工实力的上升及其对资本家造成的威胁是有限度的。正如谢克(Shaikh,1986)所指出的,“任何公司,只要单位劳动成本(实际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持续上升,无论时间长短,都是冒着破产的风险。尽管围绕工作日长短、强度和工资而展开的阶级斗争是决定工资水准和利润率的关键因素,但是这种斗争只是在这个制度的内在趋势所规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些趋势是阶级关系本身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作为一种独特的剥削形式——的结果,同时也是系统的机械化及生产资本化的结果。试图推翻这些趋势的阶级斗争,必须同制度本身较量”。也就是说,必须将阶级斗争置于生产过程内部的物质关系下进行辩证分析,而不是将其看作是决定体系发展的“天降救星”(Wright,1999)。因此,长期来看,“劳动后备军耗尽—工人阶级实力上升”假说可能难以成立。因为长期来看,劳动后备军可能会因为周期性经济衰退、节省劳动的技术变革或者出现新的劳动

力供应来源而得到充分补充,这将会削弱劳工的实力。

无论是从理论分析还是从战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来看,生产率拉低论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第一,战后的生产率下降期与利润率下降期在时间上不相吻合。1965—1973年是利润率的下降期,同时也是工人的斗争积极性高涨的时候,但是同期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达到了3.3%,高于1950—1965年经济繁荣时期的2.9%(布伦纳,[2006]2016,p.159)。私人实体经济的年劳动生产率增速在1965—1973年间平均为2.7%,略低于1950—1965年间的2.8%(布伦纳,[2006]2016,p.110)。七国集团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年均增速为5.4%,60年代后期为4.7%,到了70年代早期(截至1973年)已经回升至5.6%,1973—1979年则平均每年下降3%(布伦纳,[2006]2016,p.159)。多组数据均表明,在1973年之前,生产率根本不存在下降趋势,因此并不能证明,是工人的反抗与工作懈怠导致了生产率的下降,并进一步拖累了利润率。第二,生产率下降可能是利润率下降的结果而非原因。利润率下降拖累了投资增长,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从而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布伦纳,[2006]2016,p.37,262)。资本积累意味着采用新的、现代化水平更高的生产方法,相应地生产率水平也会更高。相反,当资本积累放缓时,生产率的增长也会放缓。事实上,固定资本的增长率在1966年达到峰值后就开始下降。这表明,所观察到的生产率增长放缓只是危机爆发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其根源。而且1968—1973年间失业率的急剧上升和实际工资增长的相应放缓,也让人不得不严重质疑该时期劳工实力出现上升且就业福利保障得以提高这一说法(Shaikh,1986)。

布伦纳还称,生产率下降论是一种“社会马尔萨斯主义”的解释(布伦纳,[2006]2016,p.14)。凯沃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后备军即失业者根本就不是用马尔萨斯的术语来解释的。人们普遍认为,失业不是由于无产阶级的生育率高造成的,而是因为劳动替代型技术创新的发展、经济衰退时期的裁员等因素。技术决定论最接近古典马尔萨斯主义,但是即使对技术决定论者来说,导致增长放缓的关键因素也是工业技术枯竭,而不是土地生产率的自然限制或者看似不受控制的人口增长(Kaiwar,1999)。另外,“高工资侵蚀利润”这一说法,侧重点在于强调工人阶级的实力,例如,工会所展现出来的集体力量,而不是将人口水平视为解释利润受挤压的关键因素(Kaiwar,1999)。布伦纳承认,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他所提到的所有理论都不算马尔萨斯理论,因为它们都没有把经济问题归结于人口增长过快(“人口过剩”)。之所以借用这个术语,是因为它们都试图用技术开发能力的日渐式微^①来解释盈利能力的下降。

^① 这一因素导致了生产率增长的下降。

不过,对于经济而言,这属于外生因素(Brenner,1999a)。

令人感到困惑的是,一方面,布伦纳强烈反对长期低迷的供给侧解释,但是另一方面他似乎也难逃供给侧解释的窠臼。甚至可以认为,布伦纳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解释与利润挤压论有很多共同点(Fine et al.,1999)。首先,布伦纳对利润率下降的解释部分倚重工人工资的上涨。仅凭制造业利润率下降,无法解释整个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变动,因为一个行业的价格下降会降低其他行业的投入品价格,这样后者会受益,利润率也会上升。在布伦纳的分析中,随着低成本生产者以及低价商品的进入,工人的实际工资会上涨。布伦纳写道,“如果劳动能够从价格下降中得到好处”,即在“实际工资上升”的假设下,那么竞争“实际上会导致整个经济的利润水平下降”(布伦纳,[2006]2016,p.32)。所以,无怪乎杜梅尼尔与列维评价道,布伦纳与利润挤压论者的区别只是布伦纳将工资份额的上涨及其所引致的利润率的下降归咎于资本竞争而不是劳工造成的压力。其次,在探讨那些从长期低迷一开始就有助于恢复盈利能力的手段时,布伦纳又把雇主对劳工日益加剧的打压,以及由此造成的劳工力量削弱,置于其分析的核心位置。正是由于雇主的进攻,工人实际工资增长甚至是实际工资水平出现了大幅下降(Duménil and Lévy,1999)。不过,在回应文章中,布伦纳认为两种说法并不矛盾。理由是:首先,导致总体盈利能力下降的实际工资上升,并非源于或依赖于劳工力量的增强,或者阶级力量平衡的任何变化。它只要求资本无法阻止工人从价格下降中获益。价格或者盈利能力的降幅越大,范围越广,资本收回全部收益的可能性就越小。其次,劳工实力的增强确实可以降低利润率,但是无法解释盈利能力长期过低所导致的长期停滞。最后,虽然工人不可能长时间地压低利润率,但是资本家阶级却可以通过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尤其是通过降低工资增长)来抵消利润率的下降(Brenner,2002a)。

确实,对利润挤压的判定,并不能单纯看工资或者利润份额的高低,而是要考察工资或者利润份额背后的阶级力量对比以及技术进步的程度等因素。简言之,工人的命运取决于资本家是否赚钱——因为这关乎资本积累是否成功,而成功的资本积累是就业和实际工资增长的必要条件。如果阶级斗争挤压了资本家的利润,那么资本积累也会放缓,从而造成失业率上升或者投资转移到其他领域。这时,工人对利润的挤压往往会得到缓解。同样,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盈利能力的严重下降,只要企业想存活下去,就只能通过单独或集体行动来削减“可变资本”,即削减实际工资和社会工资。原因很清楚,盈利能力的下降意味着企业竞争力的下降,这将危及企业的生存能力。如果劳动剥削程度能够提高,那么,企业的利润自然也会增加,生存机会也会增大。可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对劳工的打击并未转化为利润率的上升。一方面,雇主对工人实际

工资、工作条件和社会福利的攻击越来越成功;但是另一方面,企业的盈利能力却未能得到很好的恢复。这又是为何?根据布伦纳的看法,罪魁祸首还是“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过剩”,其逻辑链条是: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过剩→盈利能力下降→投资不足→生产率增长放慢→利润率进一步下行。这里的关键在于实际工资增长下降带来的正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又被雇员生产率增长下降的负效应抵消了,而生产率增长的不足来自投资下降。布伦纳的论点看起来似乎有些前后矛盾,因为在强调 20 世纪 70 年代掀起了一波大规模的投资浪潮(布伦纳,[2006]2016,p. 39)之后,他又援引 20 世纪 70 年代的投资不足来解释当劳工实力受到严重侵蚀时,利润仍然很低的原因。由此可见,布伦纳未能明确说明从投资过度到投资不足这一转变过程的具体时间节点(Crotty,1999)。

三、国际竞争过度论是否站得住脚

布伦纳认为,总利润率下降是长期衰退的原因,它源于资本家之间日趋激烈的横向竞争所引起的产能过剩和生产过剩(布伦纳,[2006]2016,p. 7)。制造业盈利能力的下降和修复失败不是由于成本上升,而是由于贸易竞争加剧带来的价格下行压力。这种压力表现为美国经济中制造业和非制造业截然不同的利润率水平和趋势。由于非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国际竞争的影响,所以能够很容易地提高价格,价格与成本的更快上升可以保持一致,利润率只有温和下降。但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制造业企业无法在成本上升的同时提高价格。究其原因,在于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战后初期,德国和日本依靠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先进的经济体制、低估的汇率以及保护主义取得了经济繁荣。此时,尽管美国生产商也受到了一定的损害,但是因为他们拥有技术上的巨大领先优势,并且在庞大的国内市场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因此损失相对较小(Crotty,1999)。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美国制造商开始受到后起发展集团特别是日本和德国的廉价商品的冲击(布伦纳,[2006]2016,p. 117)。一方面,竞争力下降导致美国制造业出口下降;另一方面,大量制造业产品进入美国,制造业进口渗透率显著上升。面对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美国制造商无法维持原有的利润率。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期和 70 年代初期,美国经常项目出现赤字,布雷顿森林体系加速崩溃,随之而来的美元大幅贬值使得美国商品变得越来越便宜。面对这种情形,日本和德国的生产者采取的措施也不是重新配置资源,而是接受利润率下降以维持市场份额(布伦纳,[2006]2016,p. 143)。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需求刺激反过来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产能过剩问题。后来,随着东亚的制造商的加

入,不平衡发展在空间上进一步扩展,使得衰退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布伦纳,[2006]2016,p. 40)。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所采取的降低成本、新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努力并没有让经济活力得到恢复,主要是因为国际制造业的周期性产能过剩长期存在。一方面,为了应对利润率的下降,公司被迫削减投资和雇佣岗位,降低劳动力成本等各种支出,结果导致需求周期性恶化;另一方面,在面对利润率下降时,高成本、低利润的公司不是选择从供给过剩的行业退出,重新配置生产资料,而是继续坚守原来的领域,奋力保住自己的“青山”。同时更具成本优势、更有效率的新兴制造商陆续加入国际竞争队伍,导致竞争不断升级,使得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局面日益恶化(布伦纳,[2006]2016,序言,pp. 3-5,p. 24;Brenner,1999a)。持续的长期衰退表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已经无法通过充分削减或重新配置其生产能力来实现盈利(布伦纳,[2006]2016,p. 7)。

从布伦纳的论述可以看出,制造业的国际竞争过度是利润率迟迟难以好转的关键因素。然而,一些学者指出,将利润率下降归咎于国际竞争的线性解释存在严重的问题。第一,制造业贸易差额的变化太小,不足以解释同时期利润率的大幅下降。1965—1969 年,美国对德国和日本的贸易总额从 2 亿美元逆差上升到 21 亿美元顺差,但区区 23 亿美元的变化,规模尚不及 1969 年美国制造业总产出的 1%(Crotty,1999)。而且,这一时期的商品贸易额占美国商品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相当低,直到 1970 年才开始迅猛增长。此外,实证研究并不支持“贸易差额所体现的国际竞争力是平均利润率演变的关键因素”这一论断(Zacharias,2002)。1950—1964 年,伴随持续贸易顺差的是盈利能力的急剧下降。相反,在 1983—1997 年,伴随持续贸易逆差的是盈利能力的稳步增长。在 1983 年以前(1972 年除外),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国际收支均保持盈余。第二,制造业产品价格的下行压力,不仅源于贸易竞争加剧带来的供给过剩,同时也受到紧缩性宏观政策的影响(Crotty,1999)。也有学者指出,制造业相对价格的稳步下降趋势反映的是制造业产品生产效率的相对提高,国际竞争只解释了利润率围绕下降趋势呈现的波动而已(Duménil and Lévy,1999)。第三,经产能利用率调整后的制造业利润率同样表现出持久的下降趋势(Shaikh,1999)。第四,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和价格竞争只能解释制造业利润率的下降,而无法解释整个经济利润率的下降(Duménil et al.,2001)。第五,利润率开始下降的时间与制造业国际竞争开始加剧的时间并不一致(Beitel,2009),前者始于 1965—1967 年,而外国公司大举进入美国市场是在 1970 年以后。

布伦纳反驳道,美国占世界制造业出口的份额在 1965—1969 年下降了 25%(Crotty,1999)。与此同时,1965—1970 年间,制造业进口年均增速达

19%,导致制造业进口渗透率从1959—1966年的平均6.9%上升到1969—1973年的平均15.8%(Crotty,1999)。此外,国际竞争对利润率的影响并不倚重制造业贸易余额趋势(Brenner,2002a)。这是因为,就像进口份额一样,贸易余额并不是一个表征竞争力的可靠指标,一部分原因在于它极易受需求趋势的影响,而后者与竞争力无关;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它没有反映盈利能力的潜在趋势。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增速快于其贸易伙伴,或者人口有更高的消费倾向,那么其总需求和进口都会相对较快地增长,进而对贸易余额产生抑制作用。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制造商在面临竞争时,更愿意通过牺牲市场份额来维持盈利能力(价格),那么其出口规模将会受到抑制,进而导致该经济体贸易收支状况的恶化,反之亦然(Brenner,2002a)。

贝特尔(Beitel,2009)指出,根据布伦纳的观点,低成本生产厂商的进入损害了在位公司的定价能力,并通过价格下跌挤压利润空间。若是如此,在国际市场竞争压力持续增强的背景下,由此产生的价格下行压力将表现为要么直接拉低价格水平,要么导致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可是问题在于,1967年以后与利润率下降相伴随的是更高而不是更低的通胀。战后扩张期的一个基本特征恰恰是物价总水平的持续增长,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Husson,1999)。福斯特(Foster,1999)推测认为,价格竞争一直受到极大的抑制,说明垄断程度非常高。事实上,全球规模的大型并购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如果垄断大量存在,那么垄断资本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竞争和价格,而不会出现因过度竞争所导致的产品价格下降和利润率的大规模下降。布伦纳(Brenner,1999b)承认,二战后初期,在汽车、钢铁、橡胶等行业,掌握最先进技术美国公司集团面对羸弱的海外对手,尚能通过直接或间接合作来操控价格。然而,好景不长,它们很快便遭到强劲对手的激烈竞争。而且,垄断也不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垄断的形成最终是以市场进入壁垒的有效性为前提的(Brenner,1999b)。随着全球资本流动性和机动性的提升,特别是在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企业能够迅速筹集所需规模的资金,进入高利润领域(Brenner,1999b)。在日本、德国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由于制造商和银行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企业能够极其容易地从银行获得融资,并且这些国家的政府往往也会大量资助企业(Brenner,1999b)。在这种背景下,很难认为寡头企业能够充分抵御竞争压力。像交通、冶金、化工、电机、纺织等行业,由世界市场决定的价格水平,使其无法维持以往的回率,不得不忍受利润率的大幅下跌(Brenner,1999b)。此外,资本集中与资本集聚既是资本主义竞争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本家打竞争战的手段(Brenner,1999b)。关于战后时期很少出现价格下降的情况,布伦纳在一处注释中指出,他的观点只涉及成本和价格的相对趋势,而不是绝对价格(Brenner,

1999b)。制造业利润受到挤压,是因为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和生产过剩(由于成本更低的生产者将更便宜的商品投入市场)使得厂商无法像以前那样可以充分加价以抵消不断上升的成本(Brenner,1999b)。

也有学者指出,布伦纳对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利润率的比较及其趋势的观察可能具有误导性。杜梅尼尔和列维(Duménil and Lévy,2002)研究发现,在美国制造业部门,利润率与非制造业利润率的差异,主要集中在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和公共事业部门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约占经济产出的八分之一。实际上,占经济总量 57.3% 的非制造业部门,其平均利润率水平与制造业部门基本持平,趋势相同,降幅相同,复苏同样有限。因此,与非制造业相比,制造业的利润率水平并无显著不同。对此,布伦纳(Brenner,2002b)回应道,理论上,利润率趋于平均化机制并不是在产业整体层面,而是在个别行业起作用的。战后头二十年,美国行业间的利润率存在巨大分化,电气机械、非电气机械、运输设备、化工及相关产品以及皮革制品等行业的利润率水平,一直比非农非制造业总利润率高出 50%~100%,甚至更多(Brenner,2002b)。而金融、保险与房地产业的利润率是非农非制造业总利润率的两倍或三倍,烟草行业的利润率则高达 10 倍或 20 倍(Brenner,2002b)。因此,仅仅因为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利润率没有趋近平均水平就将其排除在外没有意义。根据布伦纳自己的计算方法,即使剔除交通运输业和公共事业部门,1965—1973 年间非农非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也只下降了 17.3%,而制造业利润率下降了 41.4%,后者的降幅远远大于前者,说明利润率级差仍然存在(Brenner,2002b)。美国制造业利润率下降是由于国际竞争加剧,致使其不能实现充分的成本加价。1965—1973 年,与非制造业相比,制造业的单位成本要低得多,但是盈利能力降幅更大。究其原因,是因为制造业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而非制造业基本不受影响。这一点也反映在价格涨幅上。据统计,制造业价格涨幅为年均 2.1%,远不及非制造业的 4.4%(Crotty,1999)。

亦有批评者指出,布伦纳对萧条的分析完全是一种资本家之间的协调失败或者说市场失灵分析。这样一来,无须通过阶级斗争,通过建立“萧条卡特尔”(depression-cartel)、协调资本行动等方式就可以解决危机问题(Fine et al.,1999;Lebowitz,2000)。布伦纳的分析倾向于支持自由派改革派的“资本节制”计划和“超国家经济规划”(Smith M,1999)。实际上,成功的协调是不可能的。尽管二战以后美国利用其霸权地位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协调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强国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和需求,常常相互倾轧,因此全球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注定是无法克服的。生产全球化和资本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是当代资

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爆发的总根源。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一次又一次的“调整失败”已经为此做了注脚。

四、竞争关系与劳资关系的优先地位

资本是一种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但“资本是而且只能是作为许多资本而存在,因而它的自我规定表现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e,p. 95)。从积累来看,积累既表现为资本作为总体的扩张过程,又表现为扩张中单个资本的相互作用过程(Weeks,1979)。从对剩余的占有来看,资本家占有的是剩余价值而不是直接占有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为售卖而生产决定了资本不但要在市场上与雇佣劳动者发生交易关系,也必须在市场上同其他资本发生交易关系(高峰,2012)。单个资本家的利润赚取与资本积累是通过竞争性的经济活动来实现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个通过市场竞争强制所有资本家不断进行积累与扩张的体系。积累过程是一种通常伴随着生产率变革和资本集中的规模扩大再生产,“竞争规则迫使资本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意味着,活劳动从生产过程中被排挤出来”(Weeks,1979)。所以,“资本的剥削关系是资本竞争关系的基础,资本的竞争关系又是实现资本剥削关系的必要条件,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它们共同构成了资本的内在本质或本质规定”(高峰,2012)。一如托尼·史密斯(Smith T,1999)所言,资本与劳动的全部关系必然涉及资本之间的关系,资本之间的全部关系必然涉及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孟捷和向悦文(2012)将二者视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两个基本维度。

布伦纳指责供给侧解释片面强调资本与劳动的“纵向”关系,低估了资本之间的“横向”关系及其引起的经济矛盾(布伦纳,[2006]2016,p. 23)。在他看来,是竞争的逻辑而非阶级斗争主导着经济增长或衰退的深层节奏。福斯特(Foster,1999)指出,把过度积累和产能过剩仅仅视为竞争的反映,忽视了真正的深层次问题及其与剥削的关系。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资本之间的竞争(也不在于垄断),而在于直接生产者榨取剩余产品的方式,即现实的剥削和阶级关系(Foster,1999)。正如不能从市场或资本之间的竞争来发现利润来源一样,盈利或资本积累危机也无法通过对市场或竞争的分析而得到充分的解释(Foster,1999)。

固定资本的扩张,根源在于资本与劳动的阶级斗争,还是资本为了生存而与其他资本展开的斗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从竞争以及由竞争引伸出来的缩减生产费用的规律来说明机器的采用是很容易的。这里必须用资本对活劳动的关系来说明机器,而不考虑其他的资本。”(马克思和恩格斯,1998,p. 181)麦克纳利(McNally,1999)认为,应当从一

般的资本—劳动关系,特别是工人对劳动强度的抗争中,理解固定资本增长的动因。资本家提高固定资本的投入比重,目的是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因为后者往往会抵制剩余价值的攫取。也就是说,雇主采用机械化技术主要是为了去技能化,以减少对手工劳动的依赖。因此,可以认为布伦纳“以竞争为中心”的分析,忽视了雇佣劳动、剥削以及固定资本等(McNally,1999)。而且,抽象的竞争是庸俗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之一,以竞争为分析起点,不是建立在马克思的价值范畴之上,完全混淆了分析的层次(McNally,1999)。福斯特(Foster,1999)还批评布伦纳的整个分析几乎只关注欧洲(主要是德国)、日本和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心的竞争,很少涉及非洲、拉美以及亚洲等外围地区。而且,布伦纳几乎没有关注中心支配外围的帝国主义关系,这是一个明显的疏忽(Foster,1999)。

布伦纳(Brenner,1999b)承认,工人尤其是熟练工人的抗争对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具体方式具有重要的形塑作用。但是,固定资本的增长根本不可能来自资本—劳动关系,除非认为后者与竞争压力有关(Brenner,1999b)。资本家之所以害怕工人反抗劳动强化,主要是因为除非资本家们掌控了劳动过程,否则就要面临已经掌控劳动过程的竞争对手的威胁。没有残酷的竞争,资本家就不会有强化劳动和控制劳动过程的系统性驱动力。历史地看,单纯凭借雇佣劳动的存在无法推导出资本积累规律,关键在于是否存在为生存而进行的竞争性商品生产(Brenner,1999b)。在欧洲封建社会,剥削雇佣劳动的封建领主直接占有生活资料,因而无须承受市场竞争的压力,其生产投入亦不依赖市场,故不必为了生存而进行竞争性商品生产。因此,他们通常既不会通过降低成本来寻求利润最大化,也不会系统地推动积累或创新。相反,在那些生产者虽不受超经济强制榨取,但也不拥有所需的全部生计资料(特别是土地)的经济中,他们只能依靠高度专业化生产、积累剩余和持续创新来使价格—成本比最大化,并在市场竞争中出售产品。这是因为他们的投入依赖市场,为了生存不得不屈从于竞争(Brenner,1999b)。更一般地说,在社会财产关系未能使直接生产者屈从于竞争的经济中,即使雇佣劳动很普遍,资本积累规律也会失效;相反,在社会财产关系使直接生产者屈从于竞争的经济中,即使不存在雇佣劳动,资本积累规律也会发挥作用(Brenner,1999b)。

布伦纳的追随者、政治马克思主义者伍德(Wood,1999)也声援道,竞争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生存资料的获取和劳动力的再生产才必须通过市场来实现。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竞争起着核心作用,因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依赖市场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流通领域与生产领域和剥削关系直接相关。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竞争理论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市场依赖是资本存在的根本条件,且在历史发生和因果逻辑上均先于资

本与活劳动的关系(Wood,1999)。伍德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压力并非来自资本雇佣劳动关系。恰恰相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压力造成了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普遍化(Wood,1999)。

托尼·史密斯(Smith T,1999)则认为,资本雇佣劳动关系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他生产方式区别开来的基本社会关系。虽然工人阶级创造并被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相比资本间的剩余价值再分配确实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解释必须总是以“垂直的阶级关系”为中心。劳资关系和资本竞争关系孰先孰后,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能先验地把劳资关系置于资本主义历史叙事的中心。如果在特定历史时期,资本间的“横向关系”具有较高的自主性,相对地不受劳资关系的影响,同时阶级冲突也趋于缓和,那么在此类历史叙事中强调资本的“横向关系”则是合理的。

有些学者认为,基于劳资关系的理论与基于资本间关系的理论并不冲突(Foster,1999)。从马克思主义文本看,《资本论》第一卷在抽象的理论层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的阶级本质。在这里,马克思假定竞争充分发挥作用,而暂时忽略对竞争实际机制(actual mechanics of competition)的考察。这样他就可以抽象掉许多资本问题而集中精力研究资本的一般性质。只有到了《资本论》第三卷,随着抽象向具体逐步逼近,马克思才把许多资本以及资本之间相互竞争的影响纳入分析(Foster,1999)。也就是说,只有当从资本一般中推导出基本的运动规律之后,马克思才把竞争引入分析(McNally,1999)。我们认为,无论是从理论的抽象程度还是从特定历史叙事的中心出发进行辩护,与其说是调和布伦纳与马克思之间的分歧,倒不如说是对布伦纳观点的辩护。在布伦纳的理论框架中,资本竞争关系相较于雇佣劳动关系占据着更为重要的位置。因而如何看待布伦纳与马克思的分野,仍然有待说明和研判。

布伦纳对资本竞争关系的强调,可追溯至其早期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研究。布伦纳(Brenner,2007)提出了“社会财产关系”论,社会财产关系包含三组关系:一是不同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二是不同剥削者之间的关系,三是剥削者和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社会财产关系决定了个体的经济行为方式与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鲜明的历史具体性和稳固的政治再生产性(张秀琴,2011)。前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核心是直接生产者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剥削者通过超经济强制攫取直接生产者的劳动产品。前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关系主导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因为剥削者和直接生产者不必依赖市场来竞争性地获取劳动产品,理性的行为人没有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动力(鲁克俭和郑吉伟,2006)。后来,随着15世纪西欧农奴制的解体,英国出现了“地主—租地资本家—农业工人”的阶级结构,率先打破了前

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关系,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鲁克俭和郑吉伟,2006)。

事实上,布伦纳的分析始终将劳资关系限定于阶级斗争层面。无论是其早期还是近期研究,他对资本主义所蕴藏的巨大生产力^①的考察,都只涉及市场竞争这一外在激励机制,而未能触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本身。由于这一理论缺陷,布伦纳无法解释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为什么突然“变坏了”(Lebowitz,2000)。从单个资本看,资本在竞争战中降低生产成本,竞争加剧表现为一种外部力量。然而,如果把资本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剥削率上升的结果就是资本的相对过剩,资本扩张超出了资本增殖的能力(Lebowitz,2000)。正如齐昊(2010)所言,“当马克思研究作为整体的资本运动规律时,竞争只是规律在资本内部实现的机制;当布伦纳研究微观层面的单个资本时,竞争就必然成为强迫单个资本运动的外在机制”。

以追求超额剩余价值而发生作用的竞争规律,必须以雇佣劳动关系的普遍化为前提(孟捷等,2012)。马克思反复强调,“只有在劳动者不再是生产条件的一部分(奴隶制,农奴制),或者原始共同体(印度)不再是基础的时候,商品生产才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e,p.428)。也就是说,劳动力成为商品推动了生产“在其整个范围内,在其整个深度和广度内,变成商品生产”(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e,p.427)。雇佣劳动关系的发展必然造成商品生产的普遍化,使商品生产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趋势是尽可能使一切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它实现这种趋势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产卷入它的流通过程;而发达的商品生产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马克思,2004b,p.127)机器的引入在更大规模上实现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促使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生产不是为了直接消费,产品通过市场交换才能供社会使用,普遍的交换成为每一个经济单位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随着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商品的变便宜,商品量增加了,必须出售的商品数增加了,所以市场的不断扩大是必要的,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e,p.44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必然打破各民族地区的原始封闭状态,这是由资本的性质所决定的。资本扩张会创造市场,把规模很小的地方市场结合成为规模更大的国内市场,把各民族国家的国内市场联结为世界市场。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必然造成普遍化的商品生产^②。这时,买和卖“不仅支配了生产的剩余,而且

①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a,p.36)

② 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这种生产在它的整个范围内都是商品生产)基础上”,“在商品生产及其绝对形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马克思,2004c,p.717,718)

支配了生产的实体本身,各种生产条件本身才广泛地表现为从流通进入生产过程的商品。”(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e,p.424)

为交换而生产激励着企业当事人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不断强化劳动控制。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一方面,劳动者必须服从于资本家的绝对的权威,保证“生产的连续性、统一性和齐整性”(谢富胜和李安,2009),或者说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另一方面,由于劳动者是以工资的形式取得维持生计所需的生活资料,因此,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同时是“强制与同意的特殊结合”(谢富胜,2007),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异也强化了资本家对劳动过程的控制。“通过控制实现商品生产的效率”(谢富胜,2007),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基础和实在的内容。

五、资本积累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微观机制

依据《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的内容,可以将马克思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理论概括为以下五个命题^①:

a. 对超额剩余价值的竞逐是个别资本家采用新的生产方式的动力,资本竞争推动了新的生产方式进一步扩散^②。

b. 随着总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在剩余价值率提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逐渐下降,利润量则会同时增长。

c. 规律在流通领域也表现为,单个商品的价格下降,同时商品的数量和商品价格总额所包含的利润量会相对增加^③。

d. 随着规律内部矛盾的展开,生产过剩、资本过剩和人口过剩相互叠加,引发危机。

e. 经济危机是重建资本积累条件、使周期重新通过的强制手段。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布伦纳将命题 a 和命题 c 扩展到了国际层面。对此,首先需要明确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即采用新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能够以高于商品生产价格甚至价值的价格来出售商品,并得到“他的商品的生产费用和按照较高的生产费用生产出来的其他商品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马克思,2004c,p.294)。这在布伦纳的“国际竞争过度论”中表现为:由于资源禀赋以及经济水平和历史文化的差别,不同的国家拥有极不相同的生产条件。新兴国家的制造

^① 命题 a 之前隐含着有一个前提:由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资本技术构成提高的趋势是用机器取代活劳动(王生升,2023)。

^② 参见马克思(2004c,p.294),鲁保林和陈鸿池(2022)。

^③ 参见马克思(2004c,p.251)。

业厂商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较低的工资水平,能够以较低的商品价格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这是日本和德国在1965—1969年实现出口增长和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短期内新兴国家的生产条件在国际范围内是无法复制的。但是,随着新兴国家的制造厂商进入国际市场,价格更加便宜的商品会直接冲击领先国家的制造业。这与命题a中新的生产方式扩散所造成的影响是一致的,也是布伦纳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长期衰退的核心所在。因此,可以说布伦纳的观点与命题a并不冲突。毋庸置疑,命题c同样也是如此。在反对布伦纳的声音中,克罗蒂(Crotty,1999)认为,美国制造业贸易差额在1965—1973年间的变动很小,不足以解释同期制造业利润率的大幅下降。笔者认为,尽管制造业净出口占总产出的比重极小,但是国际市场上廉价商品的涌入确实会使本土厂商的价格调整能力受到限制,并进一步侵蚀其盈利能力。

根据命题e,经济危机是重建资本积累条件的强制方式,即“把在价值上与全部追加资本 ΔC 或其一部分相等的资本闲置下来,甚至使它部分地毁灭”(马克思,2004c,p.282)。“这样,周期会重新通过。由于职能停滞而贬值的资本的一部分,会重新获得它原有的价值。”(马克思,2004c,p.284)从这里可以看出,利润率的波动具有周期性。可是,布伦纳的研究却展示了另一幅图景,即面对先进厂商的进入以及商品价格和利润率的下落,原来的资本家不是选择退出而是继续坚守,这是造成战后资本主义陷入长期慢性衰退的根源。退出不足这一现象也表明,经济危机的“优胜劣汰”机制几乎接近失灵,不足以使资本积累恢复正常。

布伦纳接受置盐定理并直接得出了下述结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若要成立,必须假定资本家会采用那些降低自身利润率并最终损害总体生产率的新技术(布伦纳,[2006]2016,p.25)。然而,这样的假定与马克思的观点是相矛盾的。因此,“需要一个将残酷的看不见的手与亚当·斯密的仁慈的手结合起来的理论”(布伦纳,[2006]2016,p.23),以理解资本主义长期衰退的历史规律性。莱博维茨(Lebowitz,2000)直接援引马克思的话来批评布伦纳由于“不理解再生产过程从总资本而不是从单个资本来看时所表现出来的联系”(马克思,2004c,p.956),因而没有看到“表面上彼此无关的各个因素的这种内在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2008,p.568)。

根据布伦纳的看法,产能过剩或生产过剩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或者说在如下意义上——市场需求不足,无法使高成本企业维持其先前的利润率水平(布伦纳,[2006]2016,p.29)。但是,他没有说明为什么市场“没有足够的需求”。马克思的理论表明,剩余价值率提高是有一定界限的,如果资本把必要劳动压缩到最低限度,那么剩余价值的实现就会出现困难。由于坚持个人主义方

方法论,布伦纳模糊了本质关系,因而对战后不平衡发展的解释便沦为市场失灵分析。他未能解释为什么单个资本的利润最大化活动产生的不再是良性结果。他笔下的作为资本主义活力之源的“资本主义内部竞争”现在变成了让资本主义痛苦的根源(Lebowitz,2000)。穆雷·史密斯(Smith M,1999)也指出,布伦纳没有解释购买力相对于总资本投资下降以及由此导致的总价格水平无法维持与平均利润率相协调的原因。劳动节约型生产率的提高是个别企业试图维持和提高利润率的微观策略。然而,个别企业的短期“理性”行为并不利于“资本一般”的中长期利益,因为企业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降低了活劳动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最终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因此,资本家推动劳动替代型技术创新的微观理性与社会资本维持一般利润率的宏观要求之间产生了矛盾。可是布伦纳没有意识到“自然”与“社会”的矛盾在解释资本主义运动规律上的重要性(Smith M,1999)。生产中人类对自然的支配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内在要求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构成了马克思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局限性的核心。前者表现为由劳动节约型技术所带来的生产力增长,后者表现为必须剥削雇佣劳动,因而以抽象劳动时间(货币)来衡量“财富”和经济绩效(Smith M,1999)。布伦纳似乎不承认,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维度和“社会”维度之间可能存在矛盾,其结果是他没有看到,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劳动节约型技术创新,在宏观层面上一定会降低作为总价格基础的总价值。随着支撑商品价格的價值逐渐变小,总价格必然下跌。正是这一机制导致资本家无法控制商品价格。换句话说,剩余价值创造的根基被严重侵蚀了。单个资本最大限度增殖资本价值的方法包含着降低一般利润率的趋势,这种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则表现为资本的“囚徒困境”(张衔和薛宇峰,2020)。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b,p. 302)。

在某种程度上,布伦纳的问题在于其方法论中的个人主义。这使他将利润率视为分散的企业决策的简单加总(Beitel,2009)。事实上,单个企业的定价行为无法解释利润率的长期变化,因为价格形成本质上受制于那些调节总利润率的因素,例如产出资本比和利润份额。企业的定价策略只能反映这些结构性因素的变动,而非其根本原因(Beitel,2009)。

齐昊(2010)评价道,“布伦纳的出发点包含着市场价值的形成过程及资本积累对它的影响,而这里所遵循的正是马克思以市场价值形成为起点讨论一般利润率的方法。所以,布伦纳对战后资本积累微观机制的研究正是其他理论所忽略的。”但是,市场价值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的。美国以及日本和德国的厂商竞相降低商品价格,是以不同的生产条件,亦即不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基础的。博纳菲尔德(Bonefeld,1999)郑重指出,布伦纳似乎把市场价格看作是由竞争决定的。

六、结语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都注意到了利润率随着资本积累而下降的现象。亚当·斯密对此的解释是:“资本的增加,提高了工资,因而倾向于减低利润。在同一行业中,如有许多富商投下了资本,他们的相互竞争,自然倾向于减低这一行业的利润;同一社会各种行业的资本,如果全都同样增加了,那么同样的竞争必对所有行业产生同样的结果。”(斯密,[1937]2014, p. 86)关于竞争为什么会导导致利润减少,斯密将其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竞争使商品的价格降低。卖方的竞争会使商品的供给超过需求,“资本的利润,随使用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而变动。……当价格下降时,利润也降到原有水平之下。”(斯密,[1937]2014, p. 115)第二,资本之间的竞争导致工资随着资本增加而提高。例如,在“大的丰年,……要雇用更多劳动者的雇主,便相互竞争,这在有的时候就使劳动的货币价格及真实价格抬高起来。”(斯密,[1937]2014, p. 84)“在繁华的都市,拥有大量生产资本的人,往往不能按他们需要的人数雇到劳动者,所以他们互相竞争,这样就抬高劳动工资而减低资本利润。在没有充分资本来雇用全体劳动者的偏僻地方,一般人民为获得职业而相互竞争,于是劳动工资降落,而资本利润增高。”(斯密,[1937]2014, p. 88)

针对斯密的论点,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内在规律,资本的趋势,只有在竞争中——在资本对资本的作用中——才能得到实现,就这一点来说,亚当·斯密的论点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998, p. 152)但是,按照斯密的理解,“似乎竞争把一些外部的、从外面引进的、不是资本本身的规律强加给资本。”(马克思和恩格斯,1998, p. 152)实际上,“只有在利润率普遍下降的条件下,而且只有在竞争之前,并且不管竞争如何,利润率已普遍地、不断地、以作为规律起作用的方式下降的情况下,竞争才能够不断地压低一切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即平均利润率。竞争使资本的内在规律得到贯彻,使这些规律对于个别资本成为强制规律,但是它并没有发明这些规律。竞争实现这些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1998, p. 27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竞争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只是使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得以实现的手段。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不能仅着眼于市场层面的竞争,而应分析生产过程中的劳资关系。

同样,布伦纳的竞争过度论把利润率下降归因于贸易竞争加剧这一外在因

素作用的结果,这也时常被诟病为新斯密主义。莱博维茨(Lebowitz,2000)称,布伦纳应该被看作斯密的信徒,而不是马克思的信徒。马克思从不否认外在因素的积极作用,但是外因一般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正如马克思在批判斯密时所指出的那样,“利润率不是由于资本的生产过剩所引起的竞争而下降。而是相反,因为利润率的下降和资本的生产过剩产生于同一些情况,所以现在才会发生竞争斗争。”(马克思,2004c,p. 281)。资本竞争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表现形式,竞争不会产生规律,而是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不过竞争战同时也是一场价格战,“战场上”的主要“武器”是价格。生产成本降低可以让资本家以更低的价格出售商品,从而把竞争对手逐出市场。利润率长期下降源于过度竞争这种说法,只是描述了现象,而没有揭示出现象背后的本质以及现象形成的根源。马克思曾指出,“竞争不能说明这些规律,它使人们看到这些规律,但是它并不产生这些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1995,p. 552)事实上,“价格下跌”很大程度上源于市场竞争带来的效率提升,但这种价格调整并不是“实现问题”的原因。只有当商品的实现价格不足以维持整个经济的平均利润率时,“实现危机”才会产生。因此,将利润率下降归咎于“实现问题”是一种同义反复。必须解释的是,相对于成本(资本投资)来说,价格无法使利润率保持稳定(乃至不断上升)的原因(Smith M,1999)。

马克思指出,正像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运动一样,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马克思,2004a,p. 368)。就利润率下降规律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马克思,2004c,p. 278),在资本积累中,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劳动及其数量将会日益失去作用。因而可以说是“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利润率的下降成为一个规律”(马克思,2004c,p. 287)。马克思曾以线段类比说明整体对部分的约束:“在分割一条一定长度的线时,也不能使它的各段线之和比未分割的原线长。……各段线的相对长度一开始就受到由各段线构成的原线的长度的限制”(马克思,2004b,p. 428,429)。同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剩余价值量也受到投入的直接劳动数量的限制。因为只有生产出来的东西才能被实现,所以价值生产的减少最终必然转化为剩余价值实现的减少(Carchedi,1999)。

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马克思,2004c,p. 278)。一方面,利润率的波动与剩余价值各组成部分的变化以及资本的竞争无关;另一方面,商品的价值从而价格和利润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耗费决定的,利润率趋向下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和必然性的规律性认识(鲁保林和陈鸿池,2022)。由此而言,利润率下降规律是对劳动价值

论的一种检验和确证。

参考文献

- 高峰. 2012. 关于马克思主义竞争理论的几个问题[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6(6): 43-48.
- GAO F. 2012. On competition theory of Marxian economics[J].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6(6): 43-48. (in Chinese)
- 关锋. 2022. “布伦纳辩论”及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效应[J]. 学术月刊, 54(5): 16-27.
- GUAN F. 2022. “Brenner debate” and its effect on the history of Marxist thought[J]. *Academic Monthly*, 54(5): 16-27. (in Chinese)
- 鲁保林. 2013. 利润挤压和利润非挤压: 理论与实证[J]. 教学与研究, (9): 47-54.
- LU B L. 2013. Profit squeeze and non profit squeeze: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J]. *Teaching and Research*, (9): 47-54. (in Chinese)
- 鲁保林, 陈鸿池. 2022. 利润率下降规律不是一个确定性命题吗? [J]. 当代经济研究, 320(4): 51-61.
- LU B L, CHEN H C. 2022. Isn't the law of tendency of the rate of profit to decline a deterministic proposition? [J]. *Contemporary Economic Research*, 320(4): 51-61. (in Chinese)
- 鲁克俭, 郑吉伟. 2006. 布伦纳的政治马克思主义评析[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 25-31.
- LU K J, ZHENG J W. 2006. A review of Brenner's political Marxism[J]. *Contemporary World and Socialism*, (2): 25-31. (in Chinese)
- 罗伯特·布伦纳. 2016. 全球动荡的经济学[M]. 郑吉伟,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original language) Brenner R. 2006.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M]. London, New York: Verso.
- 马克思, 恩格斯. 19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恩格斯. 19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2004a. 资本论(第 1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2004b. 资本论(第 2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

- 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2004c. 资本论(第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200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2009a.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2009b.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2009c.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2009d.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2009e.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20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孟捷,向悦文. 2012. 竞争与制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分析[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6(6): 32-42.
- MENG J, XIANG Y W. 2012. Competition and institutions: Marxian analyses [J].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6(6): 32-42. (in Chinese)
- 孟捷,龚剑,向悦文. 2012. 马克思主义竞争理论的发展研究[J]. 经济学家, (10): 5-12.
- MENG J, GONG J, XIANG Y W. 2012.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competition theory[J]. *Economist*, (10): 5-12. (in Chinese)
- 齐昊. 2010. 马克思主义是怎样解释金融危机的——围绕布伦纳的争论[J]. 政治经济学评论, 1(3): 147-162.
- QI H. 2010. How does Marxism explain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debate about Robert Brenner[J]. *China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1(3): 147-162. (in Chinese)
- 王生升. 2023. 政治经济学范式视阈下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兼评置盐定理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系统偏离[J]. 马克思主义研究, (7): 92-109, 156.
- WANG S S. 2023. The law of the tendency of the rate of profit to fal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paradigm—Also on the systematic deviation of

- Okishio theorem to the theory of total social capital reproduction[J]. *Studies on Marxism*, (7): 92-109, 156. (in Chinese)
- 谢富胜. 2007.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J]. *教学与研究*, (5): 16-23.
- XIE F S. 2007. Capitalist labor process and Marxist economics[J]. *Teaching and Research*, (5): 16-23. (in Chinese)
- 谢富胜, 李安. 2009. 分工动态与市场规模扩展——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J]. *马克思主义研究*, (9): 49-58, 160.
- XIE F S, LI A. 2009. The dynamics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market scale—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Marxist economics[J]. *Studies on Marxism*, (9): 49-58, 160. (in Chinese)
- 亚当·斯密. 2014.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original language) Smith A. 1937.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M].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 张衍, 薛宇峰. 2020. 对置盐定理的批判性解构[J]. *中国社会科学*, (6): 94-119, 206.
- ZHANG X, XUE Y F. 2020. The critical deconstruction of the Okishio theorem[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6): 94-119, 206. (in Chinese)
- 张秀琴. 2011. 马克思主义社会与历史理论的经济学视角——罗伯特·布伦纳教授访谈[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6): 53-57.
- ZHANG X Q. 2011. The economic perspective of Marxist social and historical theory[J]. *Journal of Beijing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6): 53-57. (in Chinese)
- BEITEL K. 2009. The rate of profit and the problem of stagnant investment: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barriers to accumulation and the spectre of protracted crisis[J].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7(4): 66-100.
- BODDY R, CROTTY J. 1975. Class conflict and macro-policy: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7(1): 1-19.
- BONEFELD W. 1999. Notes on competition, capitalist crises, and class[J]. *Historical Materialism*, 5(1): 5-28.
- BRENNER R. 1999a. Reply to critics[J].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19(2): 61-85.
- BRENNER R. 1999b. Competition and class: A reply to foster and McNally[J]. *Monthly Review*, 51(7): 24-44.

- BRENNER R. 2002a. Competition and profitability: A reply to Ajit Zacharias[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4(1): 35-44.
- BRENNER R. 2002b. The trajectory of the manufacturing profit rate: A reply to Duménil and Lévy[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4(1): 49-56.
- BRENNER R. 2007. Property and progress: Where Adam Smith went wrong[M]// WICKHAM C. *Marxist history—Writ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RCHEDI G. 1999. A missed opportunity: Orthodox versus Marxist crises theories[J]. *Historical Materialism*, 4(1): 33-56.
- CROTTY J. 1999. Turbulence in the world economy by Robert Brenner [J]. *Challenge*, 42(3): 108-119.
- DUMÉNIL G, LÉVY D. 1999. Brenner on distribution[J]. *Historical Materialism*, 4(1): 73-94.
- DUMÉNIL G, GLICK M, LÉVY D, et al. 2001. Brenner on competition[J]. *Capital & Class*, 25(2): 61-77.
- DUMÉNIL G, LÉVY D. 2002. Manufacturing and global turbulence: Brenner's misinterpretation of profit rate differentials[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4(1): 45-48.
- FINE B, LAPAVITSAS C, MILONAKIS D. 1999. Addressing the world economy: Two steps back[J]. *Capital & Class*, 23(1): 47-90.
- FOSTER J B. 1999. Is overcompetition the problem? [J]. *Monthly Review*, 51(2): 28-37.
- GLYN A, SUTCLIFFE B. 1971. The critical condition of British capital[J]. *New Left Review*, 1(66): 3-33.
- HUSSON M. 1999. Riding the long wave[J]. *Historical Materialism*, 5(1): 77-102.
- KAIWAR V. 1999. The dilemmas of late Capitalism[J].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19(2): 47-52.
- LEBOWITZ M A. 2000. In Brenner, everything is reserved[M]//LEBOWITZ M A. *Following Marx: Method, critique and crisis*.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 LIPIETZ A. 1986. Behind the crisis: The exhaustion of a regime of accumulation, a “regulation school” perspective on some French empirical works[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8(1-2): 13-32.
- LIPIETZ A. 1988. Accumulation, crises, and ways out: Some methodological

- reflections on the concept of “regul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8(2): 10-43.
- McNALLY D. 1999. Turbulence in the world economy [J]. *Monthly Review*, 51(2): 38-52.
- SHAIKH A. 1986. Current world economic crisis: Causes and implications[J]. *Guild Practitioner*, (43): 71-90.
- SHAIKH A. 1999. Explaining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J]. *Historical Materialism*, 5(1): 103-144.
- SMITH M. 1999. The necessity of value theory: Brenner’s analysis of the “long downturn” and Marx’s theory of crisis[J]. *Historical Materialism*, 4(1): 149-169.
- SMITH T. 1999. Brenner and crisis theory: Issues in systematic and historical dialectics[J]. *Historical Materialism*, 5(1): 145-178.
- WEEKS J. 1979. The process of accumulation and the “profit-squeeze” hypothesis [J]. *Science & Society*, 43(3): 259-280.
- WOOD E M. 1999. Horizontal relations: A note on Brenner’s heresy [J]. *Historical Materialism*, 4(1): 171-180.
- WRIGHT E O. 1999.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in Marxist theory of accumulation and crisis[J]. *Critical Sociology*, 25(2-3): 115-142.
- ZACHARIAS A. 2002. Competition and profitability: A critique of Robert Brenner [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4(1): 19-34.

The Second Brenner Debate

LU Baolin¹ CHEN Hongchi²

(1. College of Economic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Abstract: Brenner believes that the decline in profitability that began in the mid-1960s was rooted in overcapacity and overproduction caused by intensifie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The reason why the decline in profit rate caused by excessive competition has been delayed in recovery is mainly due to insufficient exit and excessive entry into the production sector with oversupply. Brenner criticized the supply-side explanation for only focusing on the “ver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underestimating the “horizont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and the

resulting economic contradictions. Critics argue that the linear explanation of attributing the decline in profit rate to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s seriously flawed and cannot place labor relations at the center of capitalist historical narratives a priori.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debate surrounding Brenner's "Theory of Excessiv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summarizes it as "The Second Brenner Debate".

Keywords: profit squeeze; excessive competition; manufacturing overcapacity;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labor-capital relationship